

阅读文言诗文时如何利用古汉语辞书因文定义

孙玉文

摘要：学习古汉语，阅读文言诗文，准确理解文言诗文字词句的意思，必须利用古汉语辞书。利用古汉语辞书扫除文言诗文阅读理解中的障碍，不同的学习者所达到的效果不同。当前，如何利用古汉语辞书高效能地解决阅读理解文言诗文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大家熟知的文言诗文作为例证，从仔细把握上下文的意义脉络、注重辞书的始见用例、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重视故训等方面，研究如何利用古汉语辞书因文定义的问题。

关键词：文言诗文；古汉语辞书；阅读理解

因文定义跟望文生义有本质上的不同。望文生义指不知道上下文词句的确切意义，而是从字面上去附会，从而歪曲上下文中词句的意义。因文定义指根据语境来确定上下文中词句的确切意义。

人们创造语言，是为了沟通彼此的思想、情感，创造言语的人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是明确的，绝不是可此可彼；理解对方言语的人客观上是可以把握他真正的思想、情感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就会形成误解。从误解到理解，是不断矫正的过程。我们阅读文言诗文，必须借助现代汉语，这

是规律，也是正确的途径，但不能以今为古。人们读文言诗文，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现代汉语的字形和词句的意义去理解文言诗文的字形和词句的意义。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现代汉语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毕竟继承是基础，是主要的，发展是有限的，远没有继承的地方多。

一般人只有在阅读的过程中按照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感到扞格不通时，才会去查相关资料，比如，辞书可以解决遇到的问题。其实，按照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理解文言文，有一些字词表面上是讲通了，

作者简介：孙玉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音韵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主编（北京 100871）。

但不一定讲得对。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贯彻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既利用现代汉语，又要摆脱现代汉语的束缚。不妨采取一个笨办法，那就是：即使是文言诗文中看起来跟现代汉语理解起来没什么两样的字词，也要养成查阅辞书的习惯，以免以今律古。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阅读能力就会得到显著的增强。要记住，将科学的历史观和系统观贯彻始终，这是我们阅读文言诗文时因文定义的一个总的原则。

文言诗文中，一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现象非常突出，上下文中如何具体地因文定义就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一般读者采取的正常办法是查阅辞书，勤查辞书是基本要求。辞书列了不同的音项、义项，这就要求读者从中选取一个最契合上下文的字词意义。对于文言诗文中的多音多义字，我们今天的一些古汉语辞书在音义匹配方面有一些缺陷，这时候，我们应该多查阅《康熙字典》，它在这方面做得比今人编写的辞书要好。借助古汉语辞书因文定义，有的比较容易，有的有一定难度，甚至是极有难度。本文结合一些常见的文言诗文，谈谈如何利用辞书具体地因文定义。

一、仔细分析上下文的意义脉络

阅读一篇文言诗文，通常情况是：一个句子中大部分字、词及其组合关系是古今相同的，古今诗文的意义脉络也是相同的，只是其中一两个字、词的意义不清楚，需要查古汉语辞书。这时候，要借助上下文的那些已知条件，从辞书中选取该字、词契合上下文的字义、词义，将上下文读通。这就要求阅读者仔细分析上下文的意义脉络，将辞书中的不同义项代入上下文中，看能否将上下文讲通，讲准确。这个办法可以叫“代入法”。

《王戎不取道旁李》是一篇短文：“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

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文章所表达的意义脉络、句子的语法格式以及很多字词的意义古今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理解本文的已知条件。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些词的法，有些用法在今天的书面语中还在用，有的作为合成词的一个词素来使用，有的今天已经放弃不用了：“尝”是“曾经”义，副词；“与”是“和，跟”义，介词；“诸”是“众，各位”义，“游”是“游玩，玩耍”义，“道”是“路”义，“子”是“果实”义，“折枝”指压弯了树枝，“竞走”指争着跑去；“唯”是“唯独”义，副词；“人”指有人，“曰”是“说”义；“此”是“这，这些”义，指示代词；“苦李”指味道苦的李子；“之”是指示代词，指代李子；“信然”是“确实如此”义。可以看到，即使古今有不同的地方，其中也不乏异中有同之处，我们理解文言诗文就是要利用这些已知条件。

《触龙说赵太后》是选自《战国策·赵策四》的一篇经典文言文，开头是：“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

赵太后即赵威后。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赵何逝世，赵孝成王赵丹年幼即位，赵威后执掌国政，她有民本思想，比较开明。公元前265年，秦国发兵攻打赵国，触龙说赵太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公元前264年，赵太后逝世。长安君是赵太后的小儿子，赵孝成王的同母弟弟，“长安君”是他的封号。

文中“兵”字，上下文中肯定是个名词，而且能发出“出”这个动作的名词。查古汉语工具书，知道“兵”有“兵器”“士卒”“军队”“战争，军事”等几个名词用法。首先，“战争，军事”和“兵器”二义必须排除掉，它们不能发出“出”这

个动作。“士卒”和“军队”不同，“士卒”指战士，士兵，是指个体。在上下文中，秦国是想趁赵太后“新用事”，立足未稳，而“急攻”赵国。赵国不只是缺少士卒而请求齐国派一些士卒过来支援自己，而是整个武装态势劣于秦国，想借助齐国的武装力量赶走秦国军队。“军队”一义刚好是指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正规武装组织，因此“兵乃出”的“兵”只有选择“军队”一义才合适。

“疾、病”是一对同义词。它们作名词时，各有好几个字义。“疾”有“疾病”“毛病，缺点”的意义，“病”也有这两个意义。在表示“疾病”的意义上，这两个词有时候区别不明显，它们有时候都可以指严重的疾病。但是如果上下文中既用“疾”，又用“病”，那么“疾、病”的词义是有分别的，“疾”意义是不严重的疾病，“病”是严重的疾病。《扁鹊见蔡桓公》写战国时名医扁鹊拜见蔡桓公，发现蔡桓公“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十天之后再次拜见蔡桓公，发现蔡桓公“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再过十天，他仍然拜见蔡桓公，最后发现“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最后一次拜见蔡桓公是在十天以后，他发现蔡桓公已经病在“骨髓”，不可医治了，所以他“望桓侯而还走”。

扁鹊第一次拜见蔡桓公，发现蔡桓公的病情时用“疾”字，第二、第三次拜见蔡桓公，发现蔡桓公的病情时都用“病”字，这不是简单的同义替换以避免重复，而是反映了“病”的严重程度超过了“疾”。怎么知道的呢？文言文接触多了就清楚了。《说文解字》解释“病”字时说：“疾加也。”^[1]¹⁵¹上古还有一个双音节的词语“疾病”，跟今天的“疾病”意义不同。上古的“疾病”不能换成“病疾”，它相当于一个连动结构，先“疾”后“病”，“病”重于“疾”。《论语·子罕》有“子疾病”，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的注释说：“疾甚

曰病也。”^[2]这里的“疾、病”有时不一定连用，《礼记·檀弓上》有“曾子寝疾，病。”郑玄注释说：“病，谓疾困。”^[3]据此，《扁鹊见蔡桓公》的“疾”词义是不严重的疾病，“病”的词义是严重的疾病。如果将其中的“疾、病”解释为相同的词义，那就不准确。

二、注意古汉语辞书中字义、词义的始见例

有些古汉语辞书，常常注意某一个字义、词义始见于哪一部古书。例如，《汉语大字典》是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字典，每一个汉字的每一个义项下面，引证的第一个例子强调该义项的首见书，力图克服既往辞书编纂不注重义项首见书的弊病。《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手册明确提出：“义项的第一个例句，应是现有材料中该义项最早用例。”^[4]后来的大型古汉语辞书的编写一般都注意到“首见书”的问题，这对我们利用古汉语辞书解决文言诗文有方法论的意义。

《庄子·逍遥游》写道：“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5]其中“背负”理论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背”和“负”都是动词，它们是同义连用，义为背着；二是“背”是名词，脊背，用作状语，修饰“负”，义为用背背着。似乎这两种理解都能讲通，但是不一定都合乎《庄子》的原意。

查《辞源（第三版）》，“背”的bēi音下，有“用背驮负”义，注明“参见‘背榜’”^[6]，而“背榜”是非常后起的一个词。查《王力古汉语字典》，“背”的bēi音下：“负荷（后起义）。唐代李商隐的《李贺小传》记载：‘从小奚奴，骑疲驴，背一古破锦囊。’”^[7]⁹⁹³可见，“背”作“用背背着”讲是很晚才引申出来的词义，《庄子》成书的时代，“背”没

有这个意义，所以“背负青天”的“背负”只能是“状语—中心语”结构，不可能是同义动词连用。

《伯牙鼓琴》写道：“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锺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其中，“汤汤乎若流水”有的版本写作“洋洋兮若江河”。“江河”该如何理解？查《汉语大词典》，“江河”列有以下四个义项。一是长江和黄河。最早的例证是《墨子·亲士》。二是指大河流。最早的例证是《六韬·守土》，但此例可疑，其中的“江河”仍然可以理解为长江和黄河。然后是《宋史·食货志下二》，此例可靠，但是《宋史》是元末的作品。三是犹江山，山河。最早的例证是《晋书·王导传》。四是犹江湖。^[8]泛指四方各地。最早的例证是《敦煌曲子词·菩萨蛮》，这是晚唐五代时的作品。因此，《伯牙鼓琴》中的“江河”应该指长江和黄河。这样理解，正好可以跟前面的“巍巍乎若太山”相对应。

《荀子·劝学》写道：“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其中“步、舍”押韵，都是去声自押，因此“舍”不能理解为舍弃、放弃、作“舍弃，放弃”讲的“舍”读shě，查《王力古汉语字典》，“舍”读shè有“止息”义^{[7]1026}，此处“舍”当取此义，“不舍”指弩马不停地往前走。这里“能、步”两个字的古义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能”今天不能作一般动词用，只能作助动词用。可是此处“能”是作一般动词来用，它带名词性的宾语“十步”，今天不能这样用。查《王力古汉语字典》，“能”有一个义项：“能够（做到）。”这是以为“能”可以作一般动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十单元《常用词（十）》的“能”字条：

“动词。可以作做到。”所举最早的例子就是先秦的《论语》。据此，“不能十步”的“能”是“能够做到”的意义。^[9]

“步”古今词义很不相同。《王力古汉语字典》“步”字条：“量词，举足两次为步。”^{[7]543}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又说：“六尺为步。”举足一次，相当于迈进了三尺，古人叫“跬”，两次就相当于迈进了六尺。《劝学》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步”是同类的词并列。《汉语大字典》“步”下说：“古时一举足叫跬（半步），两足各跨一次叫步。今指行走时两脚之间的距离。”^{[10]1541}可见，“不能十步”指不能达到今天的二十步，这是再好的骏马跳跃不可能达到的距离。

三、综合运用各种语言知识

任何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文言诗文也是如此。有一些语言形式上的安排可以归入修辞现象，对于我们因文定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言文中有许多修辞安排，有些修辞安排对于确定上下文的字义很有帮助。例如，排比结构和对偶结构，是我们阅读文言诗文时必须考虑的。《学弈》一文中有：“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此处“专心致志”是两个动宾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形成一个四字格，据此可知“专心”是一个词组，还没有凝固成一个词。今天的“专心”变成了一个双音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专心”确定为形容词，释义是：“集中注意力。”^[11]《学弈》的“专心”显然不能取此义。查《汉语大词典》“专心”，列了两个义项：一是“用心专一，一心不二”；二是“齐心”。据此，“专心致志”的“专心”当取第一个义项。

《论语·雍也》写道：“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2]其中“一簞食，一瓢饮”是两个“定语—中心语”结构组成的并列分句，《释文》：“食，音嗣。”邢昺疏：“食，饭也……言回家贫，唯有一簞饭，一瓢瓢饮也。”《孟子·梁惠王下》写道：“簞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其中“簞食壶浆”是两个“定语—中心语”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写道：“食，音嗣……食，饭也。”^[13]可见这里的“食”读sì，它不可能作“食物”讲，作“食物”讲的“食”读shí。邢昺、朱熹都说这个“食”作“饭”讲。《康熙字典》将“饭也”一义置于《集韵》“祥吏切”（即sì）音下，符合音义匹配^[14]¹⁴¹¹。《汉语大字典》列有“饭食”一义^[10]⁴⁷²⁹，虽然将此义置于中古的入声，不符合当时的音义匹配，但是单独列出此义，是符合古人的词义约定的。有人将《孟子》中的“簞食壶浆”看作两个“状语—中心语”结构组成的并列结构，这是将“簞、壶”都看作名词分别作“食、浆”的状语，以为“食、浆”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这是不合于古人的理解的，而且将“食”看作词类活用，这是基本的失误。如果上下文中“食”用作动词，那么它本身就有“吃东西”的动词义，为什么一定要说成“活用”呢？“簞食壶浆”作为名词性结构，在上下文中完全可以讲通，为什么要另起炉灶，作那种不太可靠的解释呢？

唐代以后出现了近体诗，近体诗讲平仄，这对我们理解它的上下文字义、词义很有帮助。以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之一为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第三、第四两句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

平。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七言的第一、第三个字比较自由，第四句“不教胡马度阴山”实际上是“仄平平仄仄平平”。查《王力古汉语字典》，“将”读jiāng时，列有“扶，扶进”“扶助”“送”“奉行”“进”“携带”“顺从，随从”诸义，读jiàng时，有“率领”“将帅”二义。此诗“将”所在的位置是仄声，因此只能理解为“将帅”，不能理解为动词或副词。查《王力古汉语字典》，“教”读jiào时，有“教化，教育”“文体之一种”“宗教”诸义，读jiāo时，“教”有“令，使，让”一义。此诗“教”所在的位置是平声，因此只能理解为“令，使，让”的意义，不能理解为别的意思，在唐代，“教”作“令，使，让”讲，读平声，不能读去声。

近体诗的对仗有所谓借对，借对分为借义和借音。借义是利用字、词的多义性，通过一个多义字、词的某一义与相应的字、词构成对仗，但诗里所用的并非该义，而是另一义。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是组诗作品，共七首，其六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恰恰”一词形有好几个词义，《汉语大词典》中“恰恰”下列了四个义项。^[15]第三个义项为“象声词。莺啼声”，其中第一个例证即杜甫此诗。《古今韵会举要》中“恰”字的解释是：“恰恰，鸟鸣声。”这是传统的解释，《康熙字典》中“恰”字的解释是：“又恰恰，鸟鸣声。杜甫诗：‘自在娇莺恰恰啼。’”^[14]³³⁰。此诗“时时”和“恰恰”是对仗，“时时”是一般的时间词，“恰恰”是象声词，二者不同门类。这里应理解为杜甫采用了借对的修辞手法，上下文中借助“恰恰”的“正好”义跟“时时”形成对仗，但“自在娇莺恰恰啼”中正意还是在于“鸟鸣声”一义上。元朝张可久的曲《水仙子·春愁》写道：“景中情谁唤起，听西园恰恰莺啼。”这里的“恰恰”只能理解为象声词。由此看来，《康熙字典》

《汉语大词典》对杜诗中“恰恰”的处理都是很有道理的。

综合运用各种语言知识解决文言诗文上下文的训诂问题，要注意古人的语言习惯，要有证据，不能随意取舍。例如，《囊萤夜读》写道：“（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其中，“练囊”的分析有分歧：一是将“练囊”看成一个“定语—中心语”结构，是名词性结构，指白绢做的口袋，作“盛数十萤火”的状语，表示工具；二是将“练囊”处理为动宾结构，“练”是名词用作动词，使……成为白绢；三是将“练囊”处理为“状语—中心语”结构，“练”是活用作动词，“练囊”意即用白绢装。后面两种意见是将词类活用发挥到极致。事实上，“练”作“已经炼制过的白色熟绢”讲很少用作动词，这可能是“练”发展出“熔炼”等动词义，为避免交际的混乱，就不让这个意义的“练”活用为动词了；“囊”作动词用，远没有作名词用常见。中古时期，“练”的这个意义经常作定语，例如，“练带”指白绢制作的腰带，“练巾”指白绢制作的头巾，“练帨”指白绢制作的配巾，“练裙”指白绢制作的下裳。查《汉语大词典》，有“练囊”条：“绢袋。”^[16]只是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古今小说》，《古今小说》是明朝冯梦龙纂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所收小说都是宋元至明代的作品，而《囊萤夜读》选自《晋书·车胤传》^[17]，这是唐初的作品，因此《古今小说》的例证晚于《囊萤夜读》好几百年。

近几十年来，随意扩大词类活用去释读文言诗文的风气很盛。上古汉语以单音节构词为主，绝大多数被人处理为词类活用的语义，实际上是固定的词义，不是上下文中的临时性用法；后代仿古文言诗文中，确有词类活用现象，但这只是一种修辞现象，是偶尔一用。我们不能随意扩大其使用范围，

将大量的非词类活用现象说成词类活用。

四、重视故训

王力先生1962年发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专门辟一节谈“重视故训”，这在当时有矫正时弊的历史意义，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字一字多音、多义的现象突出，遇到这种情况，古人给文言文的上下文注音，也就意味着释义。东西汉之交，人们开始给文言文的上下文注音，往往蕴含着释义，重视故训，包括重视这些注音。

既然我们阅读文言文，要正确理解其中词句的意义，那么我们必须重视故训。尽管许多古书没有人作注，但早期的经典古书古人基本上作出了注释，这是我们必须参考的。我们不能只查工具书，而将故训撇在一边。

先秦至汉代有一个谚语：“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个谚语见于多部秦汉古书，文字略有所差异，其中“藏、烹、亡”押韵，先秦都是阳部字。“亡”是什么意思？查古汉语字典，它有好几个字义，似乎理解为“消失”或“死”都可以。旧题黄石公《三略·中略》是汉代的作品，它对这个“亡”作了解释：“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18]可见“亡”的故训是“消失”义。

《诗·邶风·北风》写道：“惠而好我，携手同行。”^[19]¹⁰⁰其中的“同行”该怎么理解？按照今天的语言习惯，“同行”要理解为“状语—中心语”结构，一同行走。但这是《诗经》时代的

汉语，“同”可以带宾语，作“共同做某事”讲，“行”有“道路”义，因此“同行”可以是“在路上一同行走”义。毛传：“行，道也。”郑笺：“性仁爱而又好我者，与我相携持，同道而去。”可见毛传、郑笺都将“同行”理解为动词带宾语。《诗·王风·君子于役》写道：“日之夕矣，羊牛下来。”^[19]¹⁵⁷按照今天的理解，“下来”指从高处下到低处，“羊牛下来”指牛羊走下来。但是这是后代的语言习惯，《诗经》时代还没有这种用法。“下来”是一个“状语—中心语”结构，指由低处到高处，郑笺：“羊牛从下牧地而来。”

由此可见，重视故训是何等重要。当前，我们已经提炼出了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因义求义等多种训诂方法，有不少训诂高手利用它们解决了文言文阅读中许多词句的训诂问题。但是这些还只是抽象的训诂方法，“运用之妙在于一心”，有一些对训诂方法尤其是对运用训诂方法的细节不太在行的学者，没有掌握其精髓，率尔操觚，胡乱运用，造成上下文中一个字的字义多达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实为很荒唐的训诂。表面上是运用了训诂方法，实际上是糟蹋了这些方法。作出这种不合文言文原意的训诂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以为自己的解释是错误的，“敝帚自珍”，但他们的结论是如此经不起推敲，以至于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不太在行的阅读者，盲目推崇这种训诂成果，以为这种训诂成果“推倒一时”“石破天惊”，是“确论”，弃故训为敝屣，造成文言文释读的损失。宋元以来，尤其是清末以来，文言文上下文的字义训诂，轻率地抛弃故训，得出了许多言人人异的新解释。这种做法很值得重视，亟待改进。

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化之巨，甚至可以抵得上既往的三千年，当前，我们对于文言文的隔

膜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因此文言文的注释出现疏漏是历史上最多的。有以下四个主要理由决定了我们要重视故训。

一是故训作者离写作文言文的时代近，其语言中更多地反映了跟文言文相同的词句的意义。例如，《诗·豳风·七月》中有“九月叔苴”^[19]³¹⁹，这个“叔”，在相传至今的其他秦汉古书中只出现这一次。离开故训，纯任猜测，可以给这个“叔”提出不少解释。毛传说：“叔，拾也。”意思是“拾取”。毛传写作的时候，当时的语言中“叔”还有“拾”的意义。直到东汉，有的方言中“叔”还有这个意义。《说文解字》又部说：“叔，拾也。从又未声。汝南名收芋为叔。”^[1]⁵⁹可见东汉的汝南方言（这是许慎的家乡话）“叔”仍然有“拾取”义。这种情况，无疑成为故训作者的有利条件。

二是故训作者更多地反映了跟文言文相同的文化现象。《日知录集释》卷三十“天文”条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20]这也是故训作者的有利条件，这能促使他们将文言文的字词意义和上下文的言外之意理解、注释得非常到位，既入情入理又大大出乎今人的任何想象。

三是故训作者于学无所不窥，打下了深厚的古语言、古文化基础，但他们常常一辈子专治一部或几部古书，朝于斯夕于斯，反复问难，因此，他们的注释非常精到。我们看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汇校》，其中有“注解传述人”^[21]，对十四部儒道经典的传述情况做了扼要的叙述，其中所列故训作者大多一辈子只注解一部经典，像郑玄那样注释多部经典而流传下来的是很罕见的。故训作者这种精益求精的治学特点往往能保证他们的注释在传达文

言文的原意方面做得相当完善。

四是我们应该想到，历史上给古书作注释的大有人在，能将他们的注释成果传下来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很多注释都被历史淘汰了。中国学术史上，不乏治学眼光比较挑剔的人，故训距离后代时间越久，接受的挑剔就越多，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历史筛选的经典注释。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在阅读文言诗文时必须重视故训。古人的注释有时候篇幅很长，我们应该耐心地看完，细心地领会，不能浅尝辄止，不能误解古注。长此以往，我们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会得到大幅度提高。

我们须知，古汉语辞书不免有瑕疵，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轻易地否定辞书的释义。当具有一定的文言诗文的阅读能力后，我们可以既利用辞书而又不囿于辞书，真正将文言诗文弄懂、弄透，求真务实永远是第一位的。《南史》载，陶弘景好读书，“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22]陶弘景的这种读书求其是的做法值得我们记取。

参考文献：

-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何晏.论语集解[M].孙钦善，校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58.
- [3] 徐渊.礼记注：全二册[M].郑玄，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112.
- [4] 李格非，赵振铎.汉语大字典论文集[C].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241.
- [5]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7.
- [6] 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第3版（全两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371.
- [7]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5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919.
- [9] 王力.古代汉语：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81.
- [10]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九卷本[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10.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19.
- [12]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 [1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22.
- [14]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 [1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7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525.
- [16]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9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935.
- [17]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77.
- [18] 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4.
- [19] 陈才.毛诗笺：全二册[M].毛亨，传；郑玄，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20]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全三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1210.
- [21] 陆德明.经典释文汇校[M].黄焯，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6.
- [22]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3：2049.

（责任编辑：付惠云）